

一個遊民領域的田野研究

陳大衛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國內從事遊民相關領域的博碩士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大致分為量化與質化兩個取向，尤其是質化研究占了過半的數量，其中最常被採用的資料蒐集方法為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半結構式問卷調查法等，少數採用焦點團體訪問法。

然而，上述的研究法較難「觀察發生在自然狀況下的日常事件與每天的活動，也無法在維持分析性觀點、局外人的距離的同時，獲得局內人的觀點」(Social Research Method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W.Lawrence Neuman 著，朱柔若譯，2002年2月初版三刷，揚智文化出版)，難怪「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智識建構」(郭佩宜、王宏仁主編，2006年2月初版一刷，巨流圖書出版)一書中提到，若以質性研究與田野技藝相比，質性研究猶如蜻蜓點水。

在研究方面，筆者從1999年踏入遊民研究領域，迄今九個年頭，從剛開始的參與觀察法、半結構式問卷調查法、深度訪談法，逐步轉至田野研究的去除焦點、描述性問題、直接觀察筆記、信用層級，一直到分開推論、結構性問題等愈來愈像是人類學式的田野研究。

在教學方面，筆者從2000年接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創辦的遊民工作坊，帶領學生進入遊民領域的田野地進行田野研究，其所涵蓋的研究對象包括了機構內外的遊民、社政單位、警政單位、公衛單位、醫療單位、戶政單位、民意代表、民間機構、一般市民，大致上來說，舉凡與遊民業務有所相關者都包括在內。在田野地實際的觀察中，發現部分日常事件與學術論文的若干落差，例如：社會福利接受者在接受救助／補助／津貼的時候，受助者的權利與義務所產生的模糊界線與現行的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精神的差距，到底是來自個人特質？抑或是制度限制？另一個例子：遊民輔導成效累積性的困難是奠基於甚麼基礎？上述兩個例子中，筆者發現，無論是採用深度訪談，抑或是參與觀察，都無法更為貼近受助者的真實生活世界，筆者認為，必須要從局外人的社會位置（研究者）轉進至局內人（參與者），才能更貼近田野地及研究對象，也更能完整取得貼近局內人的觀點。

持續九年的遊民田野研究經驗，在人類學的研究中或許並不算長，就比較遊民相關的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研究來說，卻也不算短。筆者認為遊民這個研究領域，採取田野工作雖然成本非常的高（這並非僅是經費方面的問題，因為田野工作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研究所花費是較為便宜的），田野工作的成本應是指身體與心靈上的消耗。以筆者來說，九年來經歷了許多位田野報導人（與筆者田野關係良好的遊民，以及社會工作者的往生

或離職)的「消失」,還有就是九年來所經歷過的雙重身分及生活步調,包括在遊民工作坊實習的學生(包括大學生及碩士研究生,累計已逾兩百人),也同樣感受到田野工作遠大於其他研究方法的心力消耗。但是,比較國內採用其他研究方法的成果及累積,我們的研究收穫顯得更貼近了田野地的完整再現,以及更為完整地分析局內人與局外人的不同觀點。職是之故,筆者認為田野工作用作研究方法之一,應是更為容易建構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或許,田野工作可以視之為社會學本土化的一個強而有力的研究取向。

